

奥涅金与杜少卿的比较研究

吴超平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又无法融入人民,终日无所事事,也是一个“多余人”。他与奥涅金都产生于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时期,这证明“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嬗变密切相关,“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具有世界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家情感经历的投射,所以吴敬梓也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同时,杜少卿与奥涅金又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指出了艺术形象各自的民族性、时代性。

关键词:奥涅金;杜少卿;多余人

中图分类号: I 0-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5-0077-05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Onegin and Du Shaoqing

WU Chao-ping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nhui)

Abstract: Du Shaoqing, a portrait in *The Scholars* by Wu Jingzi in Qing Dynasty, refused to collude with feudal rulers, nor integrated himself into the populace, thus occupied with nothing as a superfluous man. Living in the intens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w culture and the old culture, Du Shaoqing, like Onegin proved that the images of superfluous men emerged during the conflicts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cultural transmutation of a nation and that this literary phenomena is cosmopolitan. Both characters carrie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writers, and Wu Jingzi is also a prophet in ideas. Besid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Du Shaoqing and ONegin, which result from the national and epochal diversity of art images.

Key words: *Onegin*; *Du Shaoqing*; *superfluous mean*

奥涅金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

金》的主人公,也是“多余人”形象的鼻祖。19世纪俄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曾经对这类人的特点做过精辟的概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

收稿日期:2011-07-17

基金项目:2010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系列研究”(2010SQRW065)

作者简介:吴超平(1978-),女,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

污,但由于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真正崇高的生活目标,因而不能有所作为,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概而言之,“多余人”形象的两大特质是:一,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二,无所事事,无所作为。

然而,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俄国贵族文学时期特有的文学现象,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存在“多余人”形象,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杜少卿就在精神上与“多余人”一脉相通。

首先,杜少卿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也无法融入人民。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自身饱读诗书,才品过人,名闻天下。对其钟爱有加的娄老伯评论他“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1]222},虞博士赞其为“奇才”^{[1]246},一心荐举他的李本瑛认为他“品行端醇,文章典雅”^{[1]226},就连对杜少卿的为人极尽诽谤之能事的高翰林,也未敢对他的文采稍有不逊之辞。但是,杜少卿除却早年参加过童生试取得秀才资格外,一生都远离科举考试。因为他深悟科举制度的本质:只不过是统治者网罗人才实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他蔑视科举,瞧不起功名富贵,第三十二回他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1]220}。当臧蓼斋对他说出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时,他笑骂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1]219}。李巡抚荐举他入京做官,他用手帕抱了头称病不去。有人要同他去会王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1]214}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行,与《儒林外史》上读书人追名逐利的风气恰成鲜明的对照。杜少卿不仅反科举,还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众目睽睽之下与妻携手同游清凉山;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尊重女性,认为多妻制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平衡;反对封建等级观念,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反对程朱理学,从人情出发解释《诗经》,认为:“《诗经》上《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

游,并非淫乱”^{[1]233}。杜少卿叛离了科举制度,远离了封建统治者,背弃了封建社会的传统,但又不能融入人民群众中。他最喜别人称呼他为“少爷”,虽然乐善好施,却也还是居高临下地认为“这些做奴才的有什么良心”^{[1]255}。言辞之间流露出家庭出身的优越感,这决定了他不可能从思想认识上真正站到民众的一边。其次,杜少卿也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不愿出去做事,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闲人;他依靠祖上留下的家产度日,从未想过本来就不丰厚的家产总有用尽的一天,坐吃山空,对于家庭而言,是一个闲人。这个大闲人最终无所作为,凄冷度日。

显然,杜少卿与“多余人”鼻祖奥涅金的质的相同是不容置疑的,以“多余人”冠之也是名副其实。然而,《儒林外史》的成书时间比《叶普盖尼·奥涅金》早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中俄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作家笔下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如此类似的形象?

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可以发现这两个人物形象形成的文化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奥涅金产生于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交战的时期。19世纪上半期,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严重阻碍俄国生产力的发展,俄国日益贫穷落后。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一世撤消了对外国物品的禁令,并允许俄国人到外国旅游,这开阔了俄罗斯人的视野。在1812—1814年的俄法战争中,异质文化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拿破仑虽然失败了,但是拿破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却征服了很多人的心,A·别士土舍夫在上书尼古拉一世时,回顾了这一情形:“军队——从将军到士兵——回来后,老是谈论在国外如何如何的好。拿来同自己的国家一比较难免发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人家那样呢?起初人们随便聊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话题便四处流传起来,因为智慧如同火药一样,只有加以束缚才是危险的”^{[3]56}。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感召下,进步青年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企图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按照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国家,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

起义。起义失败了,俄国社会有充满了压抑和窒息的气氛,一些曾经为革命所鼓舞的进步青年因此意志消沉,“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最终在忧郁、颓丧和庸庸碌碌中消磨掉自己宝贵的青春”^{[2]135}。这就是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产生的文化背景,正如刘亚丁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所言,“多余人”的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的第一批接受者是贵族青年,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而且,即使震荡停息,心灵已不可能复原,于是他们就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不知道如何行事”^{[3]84}。普希金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生活的这一现象,对之进行研究,并在作品中塑造了奥涅金这一“多余人”的文学典型。

杜少卿这一形象形成的文化背景则主要是产生于本土的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激烈冲撞。清朝前期,奉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到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新文化的萌芽,“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4]。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许多知识分子如袁枚、戴震等从人性出发对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科举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越来越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使许多知识分子陷入追求功名利禄的圈套,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吴敬梓对此深有体会,他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变革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并把它糅合灌注于杜少卿的内部世界,通过其艺术形象直指时弊。

所以,二者都是新旧两种文化相互冲撞的产物,只不过奥涅金面对的是异质文化与本土旧有

文化的交战,杜少卿面对的主要是在本土产生的新文化与旧有文化的交战。因而,“多余人”可视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即将产生嬗变的先兆。

二

然而,奥涅金与杜少卿毕竟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由不同作家塑造的,他们必然包含许多差异。

第一,多余感产生的根源不同。奥涅金的多余感源于对个人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迷惘,在作品草稿的日记中奥涅金写道:“没有比找不到活着的理由更让人苦闷了,也没有比找不到生活目的的人更感多余。”这直接道出了奥涅金感到多余的原因:上流社会的花天酒地、爱情、乡村美景、旅行等都无法使他的灵魂得到栖息,不能给他生命的激情,不具有任何价值与意义。杜少卿的多余感,则源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个人的位置。作为一个文人,杜少卿内心深处渴望能够做一番事业,但现实却是一个“走出去也做不出什么事”^{[1]228}的现实,因此,他远离封建统治,把精力投放于结交贤士、陪伴妻子的生活中。在他的身上,积蓄着“哀莫大于心死”的对现实的绝望与愤怒。

第二,奥涅金思索俄国的社会现实探索出路,最初的出发点是为寻找个人生命的精神依托,医治忧郁病。例如,他追求已婚的达吉亚娜,本质上是为了自救,给在达吉亚娜的书信中他写道:

“我知道:我的时日已经有限;
然而为了能延续我的生命,
我每天清晨必须有一个信念,
这一天我将见到您的身影……”^{[5]308}

这与其说是爱情表白,不如说是下意识中拯救自己的呓语。而杜少卿看重社会抱负的实现,在他的心目中,治国平天下与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体的,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体现了个人生存的意义。二者的差异再次凸

显出来:在思维方式上,奥涅金以个人为中心,杜少卿以家国为中心。

第三,作为“多余人”,他们都勇敢地多余了出去,但是过程不同。奥涅金经历了上下求索未果的失望后才多余出去的,而杜少卿则是看破红尘之后径直走向多余人的队列。奥涅金为寻找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进行过许多尝试:试图从写作中找寻出路,但是“不懈的劳动使他感到难捱:/他笔下一个字也写不出来”^{[5]39};意欲博览群书,从中领悟生活的真谛,但却倍感失望,因为“读来读去,什么道理也读不出”^{[5]40}，“每本书都带有各自的锁链;/古旧的东西早已经衰老,/新东西也哼着旧的强调”^{[5]40};继而,把目光转向实践,希望通过实施地租制给农奴一定的自由,改善地主与农奴的关系,但是遭到其他地主的阻挠,只能不了了之。失败接踵而至,奥涅金最后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多余人。相对而言,杜少卿则较为消极,他否定科举制度、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于是拂袖而去,从此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杜少卿没有积极地在出仕与隐逸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为自己的人生设想另外一种可能。

至此,杜少卿与奥涅金的差异豁然在目,然而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以及时代特征紧密相连。

现实生活对奥涅金毫无意义,这折射出一种强烈的自责与反省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罪感文化”,西方文化的渊源、东正教的影响,使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普世情怀,他们视拯救俄罗斯、拯救人类为自己的天职。但现实中障碍重重,他们一方面为俄国的落后悲哀,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自省自责之后,俄国知识分子的归宿有两类:一类通过自我反省走向实际的行动;另一类经过思考,认为无力回天,遂沉于自责,这就是“多余人”。奥涅金就是经过痛苦的探索,看到自己即无法改变俄国落后的现

实,又无法拯救苦难中的人民,因而自感多余,这多余本身蕴含着深深的忏悔与无限的叹息。同为“多余人”,杜少卿则缺乏这样的自责与反省,把自己的多余归之于外部世界,这是因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本身就缺乏一种深刻的忏悔精神,“中国式的宗教都是求生、求乐的宗教,缺乏西方人那种原罪意识。所谓‘三省吾身’之类的反省,也主要是高度理性意义上的出于对个人道德的自信的一种对过去行为的检视,而缺乏忏悔的那种强烈的自谴自责的情感体验”^[6]。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忏悔精神,把个人在仕途失意的原因归结于小人当道的时世,即使是自己酿成的悲剧,也只需得一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元稹)、“东风恶”(陆游)便可了事。所以,杜少卿把个人多余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客观世界就不足为奇。

奥涅金有着很强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但是同时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是因为俄国人具有互为矛盾的性格因素。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曾对俄国人的性格做出如下描述:“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一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7]3}。而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悠久传统,孔子曾说“士若怀居,不足为士也”。杜少卿也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讲究实用,以人生的幸福为原则。这使得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具体到知识分子的身上,即在任何时候都善于找到排解胸中块垒的出路。得意时兼济天下,失意时独善其身,纵情山水就是变通性格的鲜明体现。吴敬梓也是这样,失意时不问世事,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之中寻求解脱,杜少卿就是这种性格的生动再现。

另外,从时代特征上来看,奥涅金生活的时代沙皇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自由、平等、博爱”深入人心,而杜少卿生活的乾隆时期清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就意味着奥涅金的探索有精神的动力有榜样有方向而杜少卿没有,所以杜少卿不能够象奥涅金那样积极探索。其次,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例如俄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十二月党人,他们不能容忍农奴制的继续,不能容忍沙皇的专制,于是用起义表达自己的反抗。既有民族的传统的影响,又有斗争精神的鼓舞,这都促使奥涅金有一定的勇气面对现实进行探索,进行实践。而清朝当时处于乾隆时期,社会稳定,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文化多元化观念,但是毕竟没有产生十二月党人那样的革命政治群体,更没有产生十二月党人那样轰轰烈烈的起义。相反,魏晋风度影响了中国的很多传统文人,吴敬梓就是其中一个。在《买陵塘》中他写道:“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在移家南京后因病辞征,

吴敬梓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作者又以神来之笔把这股精神注入杜少卿的骨髓,因而杜少卿消极避世。

三

综上所述,杜少卿远离了封建统治者,又无法融入人民,只能终日无所事事,也是一个“多余人”。他与奥涅金都产生于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时期,这证明“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嬗变密切相关,“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具有世界性。与世界文豪普希金相比,清代作家吴敬梓同样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批判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审视社会生活,映射时代精神,以思想上“报晓的先觉者”谓之并不过分;二者的差异则表明了艺术形象的民族性、时代性。人类的精神生活虽然千差百异,但是基本的内涵不会改变,二者的比较研究再一次证明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存在的合理性。

参 考 文 献

- [1]吴敬梓. 儒林外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吴晓都. 俄国文化之魂——普希金[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 [3]刘亚丁.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 [4]高翔. 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2000(4):185.
- [5]普希金. 普希金选集:第5卷[M]. 智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6]胡刚亮. 十字架上的拯救——中国与俄国知识分子忏悔意识之比较[J].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79.
- [7]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邱守娟,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5.
- [8]王德碌. 论中俄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兼对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的探讨[J]. 贵州社会科学,1991(4):24-27.